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〇期 ——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306d)

---

【史海钩沉】	有关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	韩 钢
【风雨人生】	纪念张龙志先生	张文灿
【文革一页】	“九一三”事件后我出任空军司令员	马 宁
【文革往事】	“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广交会的干扰与破坏	欧阳湘
【书刊序言】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序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有关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

• 韩 钢 •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

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 ◇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九四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 ◇ 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飏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飏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 ◇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

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 《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

~~~~~

## 【风雨人生】

### 纪念张龙志先生

• 张文灿 •

张龙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教育家、畜牧学家、养猪学家。曾任山西私立铭贤学院代理院长，山西农业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五届代表，全国科学代表大会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龙志先生曾于1959年和1978年两次主编全国农业院校《养猪学》教材。

龙志先生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国民经济“三年大饥荒”时期，在粮食饲料极其匮乏、科学研究条件极其简陋、政治运动不断干扰的艰苦卓绝环境下，带领团队经过多年20多个不同组合筛选对照，首次发现在农村中等营养条件下，用我国南方猪（内江猪）改良北方猪（马身猪）杂交可以获得较大杂交优势，二元杂交猪日增重为北方猪的140%，优于外国猪种。如果再加上外国猪（巴克夏猪）的三元杂交猪日增重为北方猪的154%。此项成果经过多年在山西和华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大受农民欢迎，如雪中送炭，解决了直到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粮食过关之前的重大时代难题，被誉为中国杂交猪之父。

龙志先生于1910年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自幼受孔孟之道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少年丧母，曾经失学在药店当伙计三年，在19岁那年他为了圆求学之梦，逃婚离家出走，步行千里到孔祥熙先生在山西省太谷县开办的“铭贤中学”半工半读求学。由于龙志先生没有入学手续，开始以一个扫地工落脚，是他坚持冬天在窗外听课感动了授课老师才得以破格入学。他连续三年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名字上了学校的铜匾。受教于“学以事人”和“真知力行”的铭贤精神，他孤身自力，考入著名的北京燕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45年获得国民政府资助赴美留学机会，当时抗战交通条件艰苦，日军轰炸封锁了太平洋航线，1945年4月他们由四川宜宾坐美军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到印度丁江，等了近一个月才由加尔各答改乘美军格里来将军号运输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大西洋，经过3个多月的旅途才到达美国中西部的IOWA大学。1947年底在IOWA大学获得动物生产硕士学位回国。

当时龙志先生回国之后，同时得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农学院的聘书。因为一心想回到母校铭贤报恩，龙志先生回到四川成都铭贤学校担任畜牧系教授、系主任。奉行“先立业，后成家”龙志先生，38岁才结婚成家。

解放后龙志先生饱受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干扰，经历了抗美援朝、思想改造、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灾害、四清等一系列运动的审查和考验，但是他还是逆来顺受，在运动间隙创造条件，见缝插针地进行科研教学并作出了卓越贡献。龙志先生被评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12月与陈永贵、李顺达、申纪

兰等一道代表山西省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他的命运在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却与如日中天的陈永贵有着天壤之别。

在文化大革命九死一生的岁月里，龙志先生受到大字报批判、批斗、游街、抄家等种种迫害，个人和科学研究资料损失殆尽。曾经多次不堪凌辱，忍无可忍，痛不欲生。他夫人曾桂琴先生曾经一再劝告他“我相信你没有问题，你怕啥子嘛？真金不怕火炼”。“你一了百了走了，丢下三个上中学的儿子，让我怎么办？”龙志先生不愿意自私地为了个人的解脱一走了之，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家庭责任，勇敢地选择了更为艰难、更为智慧的生路。

与全国一样，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由开始的“一斗二批三改”进化到两派斗争，由“文斗”进化到“武斗”，很快就由1967年的冷兵器长矛大刀发展到了热兵器长短枪和地雷、手榴弹。1968到1969年，学校的火炬和红旗两派分别占领了主楼、水塔和其他主要建筑，实行了武装割据。学校里每天高音喇叭、枪声、地雷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断。大部分人已经躲避不在，留下的人也家家修筑了工事，用砖头和床板把窗户挡起来，防止冷枪和爆炸物。龙志夫妇也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遣散了，老大到太谷牛徐农村，老二和老三到了陕北榆林老家。

1967年起，龙志先生被勒令到学校南部、他一手创建的实验猪场劳动改造喂猪三年。他每天从家里出发到劳改上班的地方有2—3里远，要经过两派武装割据的交叉点，非常危险。1969年3月9日上午，两派发生枪战，从太谷县火车站一直追打到农学院五楼火炬一派据点，打死了太谷纱厂一名工人和太谷中学一名学生。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曾经留美的黄率成教授正在麦田劳动改造，被流弹击中腰部，惨死现场，至今没有找到凶手。龙志先生那天从水沟爬过一段危险地区，回到家里，满头是大汗，浑身是土，发现跟随多年的怀表也丢了，他心有余悸地说，“消财免灾，消财免灾”。

龙志先生的工作是顶班饲养母猪，要割苜蓿，煮饲料，挑担饲养母猪，还要为母猪接产，管理小猪，要完成生产定额，工作量很大。那时候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大人每月的定量也只有26斤，试验站的猪还是享受文革之前省委为龙志科学研究特批的一天一斤玉米的供应，比人的定量还高。龙志先生不仅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完成定额，而且每天中午冒着酷暑严寒，拉一个平板车，到处大量采集青草，树叶，和菜叶喂猪。几年下来，他不仅超额完成了一个工人生产指标，还为国家节约了几千斤饲料。如果按照10—20斤青草、树叶转换一斤玉米计算，龙志先生那几年至少额外收集了几万斤青粗饲料。龙志先生实际上完成的是几个年轻人的工作量，考虑到已经年近六旬，身体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那些工作成绩确实来之不易。

如果文化革命的目的仅仅是将龙志先生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改造成普通劳动者，他已经做到了并且完全进入了角色，他晒得漆黑，两手老茧，穿着褪色的衣服，戴一个草帽，身上散发着猪圈的气味，活生生的一个老农。他住在猪场，三年没有休息过一天节假日，每天就喝三顿玉米面糊糊就咸菜，和普通工人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时回家看看报纸和《参考消息》。因为那段时间学校武斗，属于无政府状态，两派文攻武卫，无暇顾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龙志先生的身体状况反而也比较好，客观上就为下一段史无前例的惨烈审查做好了准备。

显然，仅仅劳动改造太便宜了那些牛鬼蛇神，在“制造敌人”的疯狂年代，对龙志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文化革命不仅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组织上”彻底清除，还要在“历史上”深挖细找，网罗罪名，彻底将他们置于死地。

1969年7月23日，中央派颁布山西两派停止武斗的《7·23》布告，军队进驻了武斗据点。武斗结束后，文革也重新走向了“正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他被告知，猪场劳改正式停止，今后集中精力交代历史问题。虽然在解放初的1955年间经过肃反隔离

审查已经做出了相信自己交代的结论。在经过时隔近 15 年的历史考验后，还是要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再过滤一遍，龙志先生再次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所不同的是，此番审查交代更加严酷，批判斗争更加惨烈，政治空气更加窒息。用当时的话语，叫“刺刀见红”。

作为学校数一数二的“大案、要案”，按照“美国特务嫌疑”和曾经加入“国民党”的猜想，龙志先生被批斗四次，隔离审查两次，甚至受到连续日夜逼供和体罚，他的生命也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峻的心灵和肉体考验。在得知一位讲师自杀后，龙志先生非常痛惜，在 1970 年 2 月 1 日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要经得起审查，国家干部应该受审查，有严重罪恶的人更应该受审查。自己如果有罪，应当老实交待，争取重新做人，自己如果没罪，群众不会审查自己。万一你认为你没罪，那么你怕什么，真金不怕火炼。况且毛主席教导说，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那是他们夫妇在走投无路时的唯一希望，在黑暗冬夜里的一线光明，也是他们在生死关头互相鼓励、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勇气和力量。

龙志先生实在左右为难，不交代新东西说你态度不端正，不老实，抗拒运动；硬是无中生有又会引火烧身，罪加一等，甚至殃及他人。龙志先生被逼迫实行白天晚上 24 小时的轮番审问和交代，有时加温度，站在板凳上；有时罚站认罪，一连几小时低头对墙。真怕他老人家顶不住，或是自杀，或是胡诌乱编，自讨苦吃，连累别人，真不知道龙志先生那几个星期是怎么熬过去的。他在 1970 年 2 月 2 日参加太谷县“宽严大会回来，看到一些从宽的例子，深受启发，在日记中写道：“再谈谈我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如果参加了，这个罪行在我的罪恶事实与活动中算不了什么，也不过是狗屎堆上加上点尿，不会因此而就罪大恶极了。叛徒、特务、有血债的罪犯都相信党的政策，坦白交待了，自己如果有这个政治身份反而抗拒，我不会糊涂到如此程度。问题是，谁介绍你参加的，填了什么表格，还有谁参加，你为什么参加，有何罪恶活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交待不出来。”龙志甚至和专案组的小将打赌说，等待有人揭发他参加过国民党，随后又被批判他认罪态度不端正。

那真是一场意志的磨炼和较量。不过他老人家也有老主意，知道他们也没有证据，所以比较坦然。他宁可受罚也不胡说，更不连累他人。清队把解放后 20 多年的整人推向了巅峰。显然，龙志先生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每次都不能逃脱的“老运动员”经历帮助了他再次渡过这次毕生最大的难关。因为经过肃反和历次运动，龙志知道虽然群众按照种种罪名审查自己，共产党最终还是会排除种种“假设”，重证据，讲事实的。

在 1970 年春节之前，经过 20 多天的隔离，审查他的专案组发现龙志先生口供前后一致，态度诚挚，心地坦然，而且睡觉时酣声如雷，才觉得他不会隐瞒重大问题。他们终于被龙志先生磨败了，开恩让他回家“继续交代严重历史问题”。虎口逃生的龙志先生回家后，见到亲人，竟然百感交集，第一次在孩子们面前留下了眼泪。他在日记里感谢毛主席，像文革中其他被审查的人那样，能够活着回家，就一定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苏东坡所言“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按照龙志先生日记，山西农学院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校一共立案审查 96 案。在经过近一年审查和五次宽严大会后（1970 年 7 月 14 日），已经定案解放 92 例，龙志先生翘首以待，心急如焚，而他其实连一个国民党员都不是，实际上是无案可定，他与几位留美教授的专案却因为“美国没有解放，不能调查”，被挂了起来。

龙志先生留下最为珍贵的史料乃是在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亲笔撰写的 200 多篇日记，日记是在第一次隔离审查（1970 年 1 月 15 日）开始 10 天之后的 1 月 25 日开始，

主要是在被隔离后面对冷冰冰的专案组人员，需要一个倾诉情感的对象，如果万一遇到不测，也留下一些文字给后人和历史。当然他也没有利用日记发泄不满，那样无疑会如“灯蛾扑火，自取灭亡”，因为文化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反革命”。日记把读者带回那个疯狂年代，原汁原味地详尽纪录了一个留美教授在长达两年时间里被诬陷、被审查、被劳改，被打入另册和全家受到株连，度日如年、浴血拼搏的心灵路程。

龙志先生与其他几位最后没有定案的留美教授一直留在劳改队继续审查交代问题，而他们的孩子们也因为龙志先生的问题“没有定案”而受到株连而被迫插队。为了配合审查，争取早日定案，龙志先生拼命劳动改造，甚至在寒冷的冬夜为了母猪接产而睡在矮小狭窄的猪圈里。

对龙志先生的审查，终于在补发被非法扣除工资5个月之后的1971年2月20日解除，他在那天写了最后一篇日记。他终于成为“革命群众”一员，恢复了小组活动和参加大会小会资格。

清队前后，学校有多位老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原因去世，包括著名的留美大豆育种和生物统计专家，山西农学院院长王授教授（1972年卒，76岁）；留美经济学家、原铭贤学院董事长兼司库刘惠芝教授在劳改中心心脏病突发，救治不当（1971年卒，59岁）；农学系主任，留美小麦育种专家黄率成教授在武斗被流弹打死（1969年卒，59岁）；留日养马专家朱先皇教授被外调人员毒打后卧轨自杀（1968年卒，65岁）；果树育种专家贾麟厚教授（1972年卒，62岁）；讲师甘睽（1970年清队自杀，53岁）等。龙志先生再一次幸运地大难不死，熬过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

1971年夏天，清队刚刚结束，“恢复自由倍感恩，惊魂稍定渴立功”的他又花了三个月主动到全省各地调查猪种资源，那时交通条件很差，许多地方不通公交车，有时他们要步行50—60里路。保护了濒于灭绝的山西“马身猪”，并且于1972年与助手一道写成“猪的杂交与育种”一书。最终，他竟然美梦成真，被学校评为思想改造积极分子。1972—1974年间，在校内外多次为教职工、学生和华北地区养猪会议上为会议代表做报告。

龙志先生对于文化革命五年来最大的痛惜乃是被剥夺了他为国家和人民工作的权利，以致教育事业和养猪事业蒙受损失。

1972年5月，在完成调查任务和《猪的杂交与育种》一书后，龙志先生和夫人请假回了一趟老家陕北榆林，住了20天。那是龙志先生从1929年19岁离家之后，43年以来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感叹“物是人非”，老家的房子还在，人都彼此认不得了，他父亲张昆明也去世20多年了。

在文化革命后期1975年，65岁高龄时，文革后期心力交瘁、刚刚恢复了系主任职务的龙志先生又遇到新的挑战。由于四人帮“学朝农，办分院”的邪风，龙志先生被分配到千里之外，偏远寒冷的雁门关外大同县落阵营农村，创建雁北分院。龙志先生经过思想斗争，临危受命，作者有幸作为教辅陪同龙志先生到雁北分院。在离开太谷农学院之前，龙志先生依依不舍，他并没有因为被“扫地出门”而耿耿于怀，把自己打入另册，而是利用走前“三不管”机会，冒着“复辟、回潮”的危险，给全校学生们作了一系列的“杂种优势的基因基础”的学术报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因为“基因”在当时还是一个全新的分子生物学概念。

虽然雁北学校教学科研条件差，龙志先生却不顾年迈多病，在雁北地区和全省开展了“山西黑猪”育种工作和杂交猪的普及推广工作。他单枪匹马走南闯北，从雁门关外至汾河两岸，



在晋阳大地行程万里，在全省办了近30期训练班，培训了几万人次。极大地推动了山西省科学养猪事业。

其实从文化革命之前，龙志先生的高血压、心脏病和肺气肿已经患病多年，到文革后期清队时，病情更加严重，有时血压高压达到280—300mmHg，吃药之后也下不来。早在1972年，他就因为高血压被山大二院下过病危通知。龙志先生知道自己不知道那天会倒下来，只不过他与时间赛跑，将生死置之度外，时时刻刻准备“以道殉身”，倒在旅途中，倒在讲台上。也许正是他的拼搏精神感动了上苍，死神多次与他擦肩而过，他竟然一次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继续为他的养猪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邓小平主政，科学春天到来。龙志先生由于成绩突出，他当选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和雁北地区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金子总要发光，经过文化革命10年的浴血奋斗，龙志先生终于做到了“凤凰涅，浴火重生”，从那里摔倒，再从那里爬起来，再次被评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78年龙志先生从雁北返回母校，和太谷家人团聚，并且担任山西农大校长。历经近30年的生死磨难，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科学救国”梦想，在他已经年近七旬时，才盼到了安安心心做学问，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带研究生的一天。龙志先生积极开展中美文化交流，主持全国“猪杂交优势利用”攻关课题，解决在新形势下学校发展的种种难题，以及人民生活对瘦猪肉不断增长的需求中的科研课题。他于1978年再次主编全国统编《养猪学》教材，他主持的《山西黑猪》也于1984年获得品种鉴定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成果奖。

龙志先生于1984年从校长位置上退了下来，他那时已经74岁高龄。因为国内那几年全国农业和养猪业形势发展很快，他这个全国的“猪头”也要从过去几十年来“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料”的“穷养猪”旧方法，过渡到以玉米大豆为主的“富养猪”的饲养方法和集约化管理方法，包括大量介绍和引进美国的大型瘦肉型品种，也就是他40年之前在美国学习的那一套遗传育种和饲养管理方法才真正能够派上用场。

1986年9月，龙志先生积极准备为在10月份北京第三次全国《养猪学》编审会议的准备工作，6日清晨，龙志先生与助手郭传甲教授约谈了会议的准备情况。龙志先生突然觉得一阵头晕，就静静地躺在了床上，停止了思想，再也没有醒来。潜伏在他身上多年的“脑中风”终于发作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刻，虽然龙志先生多年来心里早有暗示，但大家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宛如晴天霹雳，痛定思痛几年之后，始知斯人已去，生命可贵，脆弱无常，顷刻之间就会生死两茫，天人永隔，亲人间便永远没有相会机会了。也就是在几十年之后，才理解龙志先生一生中无论在任何不利形势之下都排除干扰，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而且为他的孩子们在文化革命中无所事事，虚度年华而心急如焚，因为光阴如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更何况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不知道那一天生命就会结束。

龙志先生生活的时候就是一个正直、简洁、果断、坦荡、积极向上的人，龙志先生走的安详、痛快、无忧、无愧、无惧，没有太多的痛苦。实现了他准备多年“以道殉身”的遗愿。

在龙志先生去世近20年和山西农大建校100周年之际，学校于2005年10月为龙志先生竖立铜像，发生了“师生共弹重逢泪，天人同庆化秋雨”的动人场面。

□ 本文内容来自《张龙志传（附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日记）》2003，LULU出版社。  
~~~~~

## 【文革一页】

### “九一三”事件后我出任空军司令员

• 马 宁 •

#### ◇ “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1年9月12日晚上，指挥所不是我值班，凌晨0点多值班员突然打来电话，叫我们常委都到指挥所。这时指挥所已接到上面命令，让所有的飞机都返回机场，随即叫各部队飞夜航的飞机都陆续返航落地，净空。但全部雷达都开机搜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谁也猜不出来。指挥所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时有人提出：是不是问一问空军？杨焕民司令员也急于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指挥所直接打电话到空军找吴法宪，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

9月13日，吃完早饭以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来了通知，叫兰空杨焕民司令员、刘镇政委到军区去，传达紧急事情。可是，他们从军区回来后也没向大家传达。常委们虽然都有些疑虑，但也不好问。

我们事后才知道，原来在9月13日凌晨，林彪一伙仓皇出逃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可是，当时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失事。林彪地位特殊，他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核心机密。他如果真的叛国投敌了，不仅对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夜北京更是高度紧张。周总理彻夜未眠，一直在密切关注林彪叛逃飞机的去向，同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的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以应付突发事件。

随后，周总理亲自下达全国禁空令，要求关闭全国所有机场。他强调指出：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从这一夜开始全国净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禁空令中之所以还有“林副主席”，主要是因为当时林彪的具体情况还不明朗，如果突然去掉林彪的名字会引起猜测，担心造成不应有的混乱。

紧接着，周总理用保密电话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让对方听明白，总理用隐语说：我们的那个病号，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各部队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允许任何飞机进北京。他同时下令，驻各战区的海、陆、空部队都归大军区指挥，并立即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命令。后来听说，这一圈电话打下来，总理的嗓子都喊哑了。

实际上，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找兰空杨焕民司令员和刘镇政委到军区去，就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们听了传达以后，知道林彪跑了，当时可能要求只传达到大军区和正兵团级，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也不传达，只是在小范围内跟大家通了气。那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允许多问，我们这些副职在原则方面也特别尊重他们。当听到林彪跑了之后，我们还是大吃一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吴法宪怎么把的防线，怎么能让林彪跑了。

隔了没多久，中央下发了57号文件，然后就在机关进行传达。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

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当时机关和部队听了中央文件传达后，都非常震惊，开始在思想上都转不过弯来。可是，事后又感到很庆幸，如果当时林彪真的逃到了苏联，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空军成了“重灾区”。当时，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亲自到空军坐镇处理危机。因为周总理最担心的还是空军，让李德生到空军坐镇也是非常之举。李德生领命后，立即到空军指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连续五天五夜没休息。事后周总理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受牵连比较大，这时候空军机关和下面部队都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因为他们把空军的方向搞偏了。因此，中央派李德生到空军指导工作。这期间，中央军委决定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等五人组成空军领导小组，由曹里怀牵头，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当时空军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都有军委、总部领导参加。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后，空军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军委、总部又在考虑空军新领导班子的问题。

1972年初，空军在北京召开训练安全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空军五人小组一块儿主持的。兰州军区空军派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另外还派了机关的几个处长，范围不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布置1972年的训练任务和安全工作。在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召集了一个范围很小的座谈会，大概十几个人。那时王海是空军第二训练部的部长，还有张积慧，他们都参加了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看谁能当空军司令员、政委。由于这时候下面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对空军司令员的人选问题，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请中央军委从大军区派人来任空军司令员。在座谈会上我也发表了意见，坚决支持中央派人来，而且尽可能快一些，因为空军几十万人长时间没有主要领导不行。

这时候，叶剑英说，空军司令员一定要从空军产生。接着，他又讲了一些典故，还讲了一些有关罢官夺权的情况。那些典故隐喻些什么，我当时也没太听懂。最后，叶剑英强调，空军司令员一定要从空军产生。然后，他又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我当时考虑空军建设一定要从大局出发，既然叶剑英一再强调空军司令员要从空军产生，想必军委已经有所考虑，但我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说，空军领导班子的老成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像成钧、刘震、黄玉昆、张廷发等，这些人都已从监狱、农场回来了，他们的能力都很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些人当空军司令员、政委。他们都是受林彪、吴法宪的迫害被罢官夺权打下去的，如果上面不派人的话，他们这些人当都可以胜任。我当时就提出这个意见。

#### ◇ 紧急赴京

1973年3月至5月，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由于当时空军的情况特殊，这次会议每个大军区都派有领导同志参加，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由此可见，中央对这次空军党委扩大会的重视程度。当时兰州军区空军是杨焕民司令员和刘光汉副司令员带领兰空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另外，兰州军区也有一个会议，刘镇政委就带机关的部分干部到兰州去参加军区的会议，就让我在家里主持工作。

就在这时候，航空兵六师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架训练飞机撞上了跑道上的两架飞机，损失惨重。我立即赶赴空六师处理这起飞行事故。那时兰州军区空军驻地不在兰州，在距离兰州30公里的下官营。空六师也不在兰州，离兰州也有好几十公里。就在那天晚上，在兰州军

区开会的刘镇政委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空军来一架飞机，下午接你到北京去。我问他到北京去干什么，他说他也不清楚，通知就是这样说的。

我当即赶回兰空驻地下官营，可是心里不托底，就连夜打电话给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询问情况。因为他是我的老上级，抗战时期他就是太行七分区司令员，我那时在七分区当作战股长，关系很好。我直接给他打电话说：“皮司令，我们兰空司令员、副司令员都在北京开会，政委在你们那里开会，让我在家里主持工作，六师刚发生了事故，我正在那里处理，这突然叫我去北京去干什么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那个军区派了个副政委去北京参加空军的会议，他没给你透露点消息叫我去干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皮司令你对我比较了解，外面和上面对我是不是又有反映？”他想了想说：“没有听到什么，你是不是代表一个方面的啊！我只听说对你有点反映，说你政治上比较右。”我心想这都是吴法宪给他们传的，使他对我形成这种印象。他最后对我说：“明天上午北京来架飞机，你下午就走吧。”

我听皮定均司令员这样一说，就以为一定是哪个师里的干部又到上面告我的状了，这回让我紧急赴京又可能是去挨批的，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这天晚上，我心里七上八下，也顾不上休息，赶紧找1968年的那次检讨材料。那时我也没写详细提纲，也没有写详细的文字，只有一个简要提纲记在一个本子上。我把那个本子和第一次汇报“三支两军”的那份材料找出来，准备去北京时带上。因为第三次整我时找不出大问题，也就不斗我了，所以后来我也没写检讨。这回万一人家又告了我的状的话，没有准备不行。因此，我就连夜准备，估计哪些问题可能挨批，考虑去北京后如何检讨。

第二天上午，我从下官营赶到兰州，下午就按计划乘飞机去北京。在飞机上，我还在反复考虑这次到北京去检讨什么，怎么检讨，不知不觉飞机就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下飞机以后，到机场来接我的是兰空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他是在这之前随刘光汉副司令员来北京一起开会的。在往汽车停放处走的路上，他问我：“首长，空军的会议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听说我来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上了车以后，汽车就往北京市区开。这时，谢秘书忽然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来对我说：“首长，你是不是出组织成果来了？”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哎，你说什么是组织成果？”他接着说：“空军这次会议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出精神成果，就是把林彪、吴法宪的流毒肃清，精神上思想上有个很好的成果；第二个成果就是组织成果，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就出一个新的空军常委领导班子。空军常委有了以后，再去调查研究，组成各个军区空军的班子，完了以后再向上面报。”

我那时不知道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文革”期间，我反复挨整，即便是不整我的话，我也到不了空军。空军那么多老资格，人家到空军干了几十年了，像过去的老首长聂凤智、成钧、刘震，还有许多受迫害落实政策后从农场和“五七”干校回来的老干部，他们的革命资历都比我长。像我这样资历浅的人怎么能来空军当领导，当时连想都不敢想。

#### ◇ 临危受命

我到了北京后，就直接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起初，我一直准备在会上挨批。可是，后来一看好像没有要批我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开会。这时候会议的简报很多，每个小组都有简报，因为缺席前段时间的会议，所以我就抓紧时间看会议简报，什么也顾不上，就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情况。就在这时，有极少数人可能得到了消息，就透出了风声，说我要到空军工作。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还劝说人家不要乱猜测，更不能乱讲。

其实，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这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先后还开了好几个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看到底谁能来当空军司令员。在这之前，上面就派人到我们兰空机关、部队

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是进行考核。当时并没有说明意图，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工作组还特意调查了兰空机关的几位副参谋长，后来他们分别当了兰空参谋长、武空参谋长。当时调查他们，他们也不知内情，因为我到兰空后就一门心思抓工作，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大概都说了一些好话。

会议期间，叶剑英、李德生找我和邹炎谈话，当时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当他们谈到如果调我们到空军来该怎样开展工作时，我们都表了态。我还特别强调说：“我在师里工作，军里的工作规律我还没有摸透，到空军来不合适。”我明确表示我不能来空军。这时，李德生说了一句：“要是你一定要你来空军呢？”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说：“要是我一定要我来的话，我顶多在空军下面的业务部门搞搞作战和训练等一些具体工作。”我是这样表的态，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要我到空军来，我想自己只适合在机关业务部门做一些具体的作战或者训练工作，根本就没有往当司令员、副司令员这方面想。

接着就开大会，那天的大会周总理、叶剑英等好多人都出席了。会议开始后，周总理先点名，首先叫起的是傅传作，然后就点我的名，我起立答：“到。”周总理抬眼看了看我，然后问我多大年纪了，哪儿的人啊，还飞不飞啊。我一作了回答，他这才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又点名叫张廷发、成钧等人，另外也点名叫那些刚从“牛棚”和监狱里“解放”出来的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当时，我还没意识到点我名的用意。接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讲话。最后，周总理讲话。他讲完后宣布大会结束，其他同志都可以回去，这次参加会议的军区空军领导都不要走，留下继续开会。然后，周总理、叶剑英对军区空军领导班子提了些希望和要求。

这次大会散会后，有好几个人暗示我：“你这回要‘驾辕’了。”在东北待过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驾辕”。东北有一种胶皮轱辘马车，前面套的两匹马叫龙套，后面当中负重的那匹马或者骡子，叫辕马。“驾辕”的一般寓意是承担重任或当主官。因为周总理点名时，我的名字排在第二名，比较靠前，所以一些人就猜测，说我可能“驾辕”。我对他们说：“可别瞎猜，更不能犯自由主义。”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到空军去“驾辕”。

实际上，就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确定了空军新领导班子成员。然后，上报中央审批。大概过了一周，中央正式下达了空军新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我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为副司令员，高厚良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为副政治委员，梁璞为参谋长，先前的空军五人小组被撤销。周总理、叶剑英接见了空军新班子成员并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空军一年来“批林整风”的成果，要求空军振奋精神，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改变空军面貌。

对于中央的任命，我确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听到宣布任命我为空军司令员的那一刻，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想到会让我从兰空副司令员的职位上直接升任空军司令员。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在空军党委扩大会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应该尽快选配空军司令员。起初，毛主席想让李德生直接留在空军，因为经过他在空军一年多的清查工作，空军的工作已基本走上正轨，他对空军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了。在征求李德生的意见时，他说空军是个技术军种，自己不懂飞行，不行。后来，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说：“空军司令要能上天，海军司令要能下海。”还要求与林彪集团没有瓜葛。那时李德生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对空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周总理就让李德生推荐人选。李德生原来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我当年在他手下当团长，他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就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推荐了我。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调到兰空以前，曾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在“文革”中挨整受批判，自然就和林彪一伙划清了界限，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实际上，在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张廷发，再一个方案是我。那时候作为当事者，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上面有两个方案，也不可能知道。

当时，李德生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工作基本上搞完了，这给我们新班子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后续的工作仍然很艰巨，下面的清查工作还在继续。在这方面新班子坚持实事求是，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及周总理关于“主要矛盾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的指示要求，根据空军的实际展开工作。既防止清查工作扩大化，又有利于团结，从而达到消除影响、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和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空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 《党史博览》2013年第4期

~~~~~

## 【文革往事】

### “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广交会的干扰与破坏

• 欧阳湘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各领域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评价，存在“濒临崩溃”和“有所发展”两说。评价“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进行的课题。各地方、各部门的个案基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通称“广交会”），“既是一个定期的国际贸易的交易场所，又是我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宣传场所。”广交会发展的曲折历程，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尝试对“文革”对广交会的破坏性影响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并就“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评价问题提出浅见。

—

绵延10年、遍及全国的“文革”动乱，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是全方面的，尤其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以广交会为例，“文革”动乱对会务筹办带来严重困难，而且影响生产和运输。

#### （一）动乱对会务筹办的冲击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发时，第19届交易会已经结束。这届广交会成为自创办以来到会客商人数最多、地区最广、客户最多的一届。1966年秋的第20届广交会，也还正常完成筹备工作。但举办时已是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了，动乱对广交会的破坏开始显现并逐步升级。

##### 1、周恩来坐镇1967年春交会开幕。

从1967年春交会的个案，可见动乱干扰的严重程度以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干扰努力。当时，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日期迫近，云集广州的各地红卫兵给交易会的筹备带来困难，广东省军管会控制不了局势。4月12日凌晨，省军管会给周恩来并中央发去特急电，希望由中央发一个公开通知。周恩来指示按广东要求起草通知，并亲自加署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增加权威性。4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向广东省军管会、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1)不组织广交会以外人员进馆参观，不在广交会及其所属组织进行夺权；(2)各

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货源，除派往广交会人员外，不另派人参观；(3)一律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4)不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5)广交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再作变动。

尽管有了红头文件，但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4月13日晚上，广东省军管会又发来告急电报：(1)造反派密谋废除广交会工作委员会，另组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2)造反派组织已开展“四大”，态度极为蛮横。(3)就展品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并冲击各馆领导班子。周恩来意识到：只有他自己亲自坐镇广州，才能保证广交会如期开幕。14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请外贸部和外贸学院的造反派立即派人去广州，协助解决问题。周恩来于上午11时15分飞抵广州，11时半就同有关负责人谈话，要求全面掌握广州局势。接下来就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做造反派的工作，直到15日凌晨。15日白天，他到现场视察展馆，与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11点半，周恩来又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逐一展开说服教育工作。座谈会一直开到16日早晨7时30分。4月19日凌晨2时，周恩来再一次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当日6时许，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

## 2、1967年秋交会推迟1个月举办。

1967年夏，全国性动乱继续进行，香港发生“反英抗暴”斗争。7月中旬，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的“筹备今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工作座谈会”，着力批判外贸部的“错误”，并将其上纲上线到所谓刘、邓“三降一灭”路线的高度。会议仍决定要如期举办交易会。但到8月，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斗争发展成为武斗。在广州，有近千人占据了商品陈列馆，广交会筹备工作无法进行；因铁路局拒收托运去广州的货物，各地展品不能发运。这时，国外敌对势力盗用广交会名义，向世界贸易界人士发出所谓“通函”造谣：外商必须具结“保证书”才能参加这届广交会。

对此，新华社于10月23日发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工作的负责人发表辟谣声明》；同时，广交会将该《辟谣声明》寄发给了所有客户。196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市有关部门努力保证交易会所需各种展品和货物并按时运到；要求公安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认真做好治安保卫工作，任何组织、任何人员都不得冲击广交会。外贸部和交通部多次联合发文督促。11月13日，周恩来耐心做广州群众组织赴京代表的工作，要求两派组织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保证开好广交会。1967年11月15日，第22届广交会终于开幕了，较预定日期整整晚了1个月。这在广交会史上是唯一的例外，但总算保证了广交会不致中断。

这届以后的广交会，有关单位未雨绸缪，应对措施也渐趋主动。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下发《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对第23届广交会工作做出7点指示：广交会及与有直接关系的宾馆、旅店、剧场等单位，从3月20日到5月20日止，一律暂停“四大”，广交会一律不接待参观。中央还特别强调“对去年秋季广交会上签订的出口合同，要认真检查，采取措施，对外履约，做到重合同、守信用。”从1968年秋季第24届广交会起，参加广交会的工作人员均需携带有本人照片的出入证，才能出入广交会。

## 3、广交会举办体制机制遭到破坏。

广交会的举办体制和运作机制，都出现了若干不正常状况。例如，交易会邀请工业部门代表来会的做法，从1967年春季的第21届交易会开始因受干扰无法实行，直至1969年才恢复。这届交易会还停止“临时党委会”的活动。因应群众运动高涨和军管秩序，领导机构

新增了4名解放军代表和5名群众代表，由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德担任领导委员会主任。这在广交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例外。1967年秋的第22届广交会，由广东省、广州市军管会，外贸部、中南局直属机关等单位的派出人员和外贸系统的群众组织、当地群众组织代表，组成领导委员会。

从1969年春季的第25届广交会起，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6省、市的工人代表70人参加广交会的领导工作，其中6人参加大会领导委员会，其余64人参加交易团、商品部的领导班子。这届交易会开幕‘前，还请工农兵代表进行展览的预审查，一直改到公认“政治气氛更浓”时为止。到1972年春季的第31届广交会，鉴于大会和各交易团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决定不再邀请各省、市工人代表参加大会领导委员会。领导委员会相应新增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口岸的外贸局负责人。至此，广交会的举办体制与运作机制基本恢复正常。

## （二）商品生产运输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

“文革”初期的动乱、武斗，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如前所述，由于交通部门的武斗，以及对广交会性质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广交会的展品无法及时运到广州。1967年八九月间，广州地区交通不畅，邮运一度中断，大批小包积压在港澳和深圳；10月初运输恢复后，大量邮包涌来广州，到春节时积压严重。据了解，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是广州海关部分革命群众抵制小包进口。1967年12月初，验包人员曾为此停止验包3天，进行辩论。

应该说，动乱对生产经营的破坏，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难题，直接影响外贸出口货源。据统计，1968年前8个月对港澳出口建材、副食品、轻工三大类下降严重。其中水泥只完成年出口计划的3.2%，钢材完成10%。据分析，就有国内政治动乱的干扰和破坏等方面原因。某些外贸单位和商业供销收购队伍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收购工作受到影响；工矿产品的生产，有几个月时间煤、电不足，加上部分地区发生武斗，生产和运输一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生产极不正常。

广交会的会务筹备秩序基本恢复后，排除干扰和解决货源供应的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72年11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增加秋季广州交易会土特产品出口货源的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研究解决。一时不易解决的，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尽快解决。(1)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收购，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2)进一步贯彻执行各项经济政策。(3)解决运输问题。几年来，土特产品大量积压在产区的情况比较严重。由于运不出来，有的不能按期交货，有的不能大量收购。除积极利用民间运力、解决部分短途运输外，要求交通部门协助解决运输问题，特别是一些鲜活商品，应予优先安排，及时调运，避免商品霉烂损失。(3)调整商业网点，充实收购人员。

## 二

相对于暴风骤雨般的动乱和武斗，极“左”对广交会的干扰和破坏更为持久，其程度也难以估算。例如，毛泽东思想宣传运动对交易业务的干扰，意识形态对出口商品的自我限制。

## （一）政治对交易业务的干扰

1966年秋第20届广交会，首要任务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意义”。广交会展馆内外共悬挂了毛泽东主席画像、照片445幅，不同规格语录牌、标牌语2673幅。



大会还组织了1000多名来宾分别与红卫兵会见、座谈、联欢，并组织访问广州市郊区的人民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1967年春季的第21届广交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出现高潮。中央指示交易会：“人人都要成为既是交易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员”。经贸活动场所变成了政治斗争舞台。开幕第一天，没有谈生意。许多来宾到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

1967年秋的第22届广交会继续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任务。有些外宾也刻意迎合中国有关人士的这方面的“口味”。例如，桑给巴尔的一位部长参观后说：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著作是宝贵的财富，看了使人懂得如何进行革命，如何进行建设。但毛泽东思想宣传也出现了“舞弊”现象。“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语录本弄脏，看起来是经常读过的，好赢得中方的好感。”1969年春季的第25届广交会开幕时，正值党的九大召开。交易会坚决把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在展馆布局上，改变以往按外贸总公司经营商品划分展馆的办法，按“红宝书”、农产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特艺品5部分设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也各设专馆。

毛泽东和周恩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示有关方面采取“降温”措施。到1969年秋的第26届广交会，中央指明：“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广交会取消在开幕式和招待会上朗诵毛主席语录，组织来会客商“早请示、晚汇报”等强加于人的做法。不少客商认为政治气氛宽松了。过去要参加一个礼拜左右的学习，担心“会上不发言不好，发言又怕讲错，思想包袱很沉重。所以许多香港商号主要负责人，开幕时不愿意来，先派职工或副手来。”这次有了显著的改变，简单快捷，谈话自然。以后几届广交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继续进行，但对交易业务的干扰程度减弱了。

## （二）对出口商品的自我限制

“文革”爆发后，由于林彪、“四人帮”大肆鼓吹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而殃及广交会展品和出口商品。1966年秋交会开幕前，各地“串联”来广州的数十万红卫兵，对参展样品及商标图案提出尖锐批评。广交会被迫对展品进行检查清理。在1967年春交会上，传统题材工艺品几乎被赶尽杀绝，展品由1966年秋交会的3万种减为2万多种。对商标的审查结果是：确有反动政治内容的商标一个，立即停止使用。应停止使用的还有：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鬼怪为题材的两个；带有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17个；以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名胜古迹、古代文物为题材的5个。采取中外人名的，连聂耳牌、冼星海牌也“不宜继续使用”。

1967年6月，广东省外贸局进一步规定：(1)政治反动的和黄色的商品，一律不许生产和出口；已经生产出来的要积极改制，不能改制的要查封等待处理。(2)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为题材的商品，立即停止生产和出口；已签合同也不再履约，可说服商人用其它商品代替，如商人对毁约提出索赔可酌情予理赔。(3)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新风尚格格不入的封建迷信产品，停止生产和出口。(4)珠宝钻翠、首饰等商品，将来肯定被淘汰。(5)奇装异服及火箭鞋等，不再生产和出口。这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困难。仅“迷信品”一项，1967年广东就少出了几百万美元。

1969年春交会后，主办单位根据展出和交易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总结报告提出：我国出口的传统手工艺品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经过“文革”，某些产品（包括部分轻工产品）的花色、图案、造型不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建议今后出口产品，应尽量考虑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该报告获中央认可。这样，极“左”思潮的破坏受到一

定抵制。但在1974年春交会上，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右倾回潮”的影响，“以神佛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为题材的工艺品一律不出口”。工艺品出口成交比上届减少约2000万美元。

“四人帮”是极“左”路线的集大成者，对广交会的破坏具有典型意义。按照上海外贸界1977年的批判，这种破坏主要有3大方面：(1)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在广交会中另搞一套。“四人帮”的党羽自夸“同外贸部进行了八次大的较量，都取得了胜利”。1969年春交会前，他们在广交会搞了个“四不做”的规定，即中性包装不做；定牌、无牌、捎印不做；D/P、D/A不做；奖励佣金不做；并公然违对外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叫嚷一切“立足于斗”，以致在1969年春交会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件，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2)反对中央有关广交会的精神。甚至扣发国务院文件。例如，外贸部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一九七六年春交会的请示》就被扣压了5个月。而且这仅仅限于事后的揭发。李先念副总理1972年说，“我到上海，马天水同志同我谈了个问题。他拿了个本本不给我。保密，其中谈到外贸好多政策问题。”(3)在出口价格上借题发挥。他们公然说：“只要手里有二三十个价格问题的事例，就可以整垮外贸部”。于是，他们到处搜集外贸部、总公司的所谓“低价”事例。1972年秋交会时，他们到广州大抓“低价倾销”，攻击外贸部“卖国投降”，诬蔑外贸部、总公司“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血汗”，破坏国内生产和市场供应。

### 三

在“文革”期间，全国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都受到冲击。但由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抗争和努力，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进展。广交会的个案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特点与优势。

#### (一) 对广交会成交量的影响程度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许多国家经济起飞的时期。我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而中国却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从广交会的个案以及对外贸易的局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由于受“文革”冲击，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从1967到1969年连续3年停滞、下降，尽管应邀到会客商仍有所增加，但并不是都来做生意，纯粹参观的不少。而且由于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执行严格的国别政策，将西方国家客商拒之门外；着力邀请的亚非拉国家客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兴趣不高。为此，中方通常承担在华所有费用乃至往来机票。由于这些国家外贸需求量小，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没有互补性。如果我们不从对方购买商品，“每年顺差，这不要那不要，结果他们派了个部长来了。主席说，短账不要了，一笔抹掉。”有时成交多，也不见得有什么经济利益。

#### (二) 广交会缘何能连续举行

在动乱和极“左”路线的破坏之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还有所发展，当然不是偶然的。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人手中。作为“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举止还是比较稳定和谨慎的，注意“抓革命，促生产”，不使生产长期陷于混乱。如前所述，1967年4月中旬，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亲自坐镇广州数天，连续几个昼夜不休不眠，确保了广交会如期举办。周恩来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细加分析，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与意识形态化话语的巧妙结合，使得举办广交会获得了革命合法性。周恩来这样劝说目空一切的造反派：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来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所以，“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至于广交会“旧东西”，其实就是装饰品。我们不用，可是在外国，工人都用，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服务呢？我们用它们换回机器、钢材等，也可以用来支援世界革命。他还诙谐地说：不要怕卖工艺品，绣花拖鞋、玉石踵，卖给资本家，还怕腐蚀他们吗？

### （三）如何评价国民经济状况

“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程度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考察“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既要关注政治运动特别是动乱，也要注意极“左”政策长期的破坏性影响。当然，评价“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要分析和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具体到某一时期和地域，还必须联系历史背景，并区分影响经济发展的“文革”因素、反“文革”因素（抵制和纠正“文革”的倾向与努力）和非“文革”因素（与动乱和极“左”政策无关联者）。

从广交会的个案可以看出，广交会在对外贸易中遭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如表1所示，广交会在“文革”期间还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速度明显放慢了。而“文革”对整个外贸的破坏比较大。其结果是，广交会每年成交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例如，在1957—1963年间，这比例在20%左右；1963年至1965年占30%左右；1966—1969年占35%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达40%以上。其中1972年和1973年广交会的洽谈成交，分别占到年度全国出口总额的54.4%和51%。在1967—1971年，中国出口额一直没有恢复原气；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是大幅下降，到1977年达到历史低点的0.67%。直到1982年，中国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才超过1966年的水平。广交会如此，不排除其他地方和部门也有类似的特点与优势。

综上所述，关于“文革”国民经济状况的“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不是完整的表述。中共十七大报告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显然是指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笔者倾向于这样表述：“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但由于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努力，国民经济仍“有所发展”。

□ 《红广角》2013年第4期

~~~~~

#### 【书刊序言】

####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序

• 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 •

1971年10月初，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中国出事了。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话。”这句话震动了西方世界。莫非，美国知名心脏外科医生保罗·怀特（Paul Dudley White）9月18日到达北京，意味着毛泽东濒于死亡？几天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宣称毛泽东身体健康，但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从9月13日开始全面禁飞。一贯忠于林彪的空军司令吴法宪9月8日起也不再公开出现了。另外三位支持林彪的将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海军政委李

作鹏以及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9月24日之后也都不再露面。古巴新闻社此前几天发自北京报道说，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游行活动被取消了。9月30日，蒙古人说，一架中国飞机9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在其境内失事。10月12日，在和中方官员磋商之后，罗马尼亚在北京召开的工业展览仪式上，只向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敬酒，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议论。

1971年11月12日，英国主流周末媒体《观察家报》一位资深编辑打电话，请我也来就这些在中国发生的神秘现象写篇文章。约稿背后的原因是，几天以前，华盛顿一些记者在高层吹风会上被告知，林彪及同伙试图谋杀毛泽东，而当蒙古坠机之时，林彪就在机上。我同参加了吹风会的华盛顿记者威廉·米林什珀（碰巧是我在牛津大学时的同校）一起合作。我们花了星期五和星期六整整两天，写出了一篇内容全面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出事了》。文章的根据，是当时已知的各种事实，同时，不可避免要对幕后的神秘作些探索。我们想到的其中之一是，毛对重建党的机器进展缓慢不满，把它归咎于林彪和他手下的将军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代替党去管理国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权力。

一星期以后，我们写的文章受到该报驻新加坡的中国报道记者丹尼斯·布罗德沃斯的含蓄的批评。显然对上星期没有紧跟形势抱有歉意，他写道：“当针对中国当前谜团的猜测使谜底变得更加神秘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追寻什么答案，倒是应该针对现有的答案提出更多的问题。”异乎寻常的是，40多年过去了，中外学者和记者们仍然在对1971年的9.13事件的一些答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先通过党内文件的形式传达最后逐渐传至西方的林彪事件的官方版本已经为大家熟知。大致是说：有野心的林彪急于尽早接毛的班，1970年试图恢复以前由刘少奇任职的国家主席。在不愿意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毛的阻碍下，恼羞成怒的林指示他儿子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林立果找了一伙空军军官，设计了在毛南巡回京的路上谋杀“B52”（这是他们使用的毛的代称）的各种各样的计划，但最后未能实施。惧怕毛已经识破阴谋，林立果赶到父母的疗养地北戴河。林立果和母亲叶群决定出逃。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把叶群、林立果将和林彪一起出逃的秘密报告了警卫团。警卫团头目给北京的周恩来打了电话。周立即打电话给叶群，结果使叶和她儿子更加惊恐，于是拽着半睡半醒的林彪上了车狂奔机场。飞机起飞以后，周恩来问毛要不要将飞机打下来，毛告诉周说让他们去吧。最后林彪夫妇以及儿子林立果在蒙古坠机死亡。

毛泽东与其“最亲密的战友”耸人听闻的决裂，引出了一些戏剧性的故事，这是不奇怪的。最离奇的是化名姚明理著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该书1983年在美国出版，出版时由颇有名气的已故美国记者史丹利·卡诺（Stanley Karnow）作序，从而具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光环。书里的内容是说林彪和其妻子叶群根本不是飞机失事，而是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用餐以后，在北京郊区被火箭弹击中座驾而死的，据信这场谋杀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丹尼斯·布罗德沃斯多半会对姚明理所提供的答案提出质疑；没有一位有信誉的西方学者会去相信这样的故事。但该书的出版说明：毛林事件的真相从来是模糊不清的，这种不清楚一直持续至今。

令人无法置信的理由之一是，林彪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居然试图谋杀毛泽东，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为什么林彪在自己名字已经被党章宪法确定为毛的接班人的情况下，还会采取这种极端行动？林比毛年轻十四岁，再过几年，接班岂不就成为定局了吗？另外，这不是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的毕恭毕敬的行为大相径庭吗？

在《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一书中，我同沈迈克认为，在1969年秋天毛开始反林的起因，是林发出的军令大规模地调动了中国的军队与装备。虽然林身为国防部长以及军委副主席，他的军令是合理合法的，而且是响应毛自己怕苏联搞突然袭击发出的。但事件本身向毛主席宣示

的，却是解放军不仅仅只听毛一人指挥，还能被其它人调动。而毛一向认为，他控制军队的能力是他本人领袖地位的根本保证，林已经构成了对毛的威胁。正如文革初期对待他另外几位同事一样，从那时起，毛就开始布局算计林彪了。

关于在新宪法里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之争的惊险情节，看来毛是想把林打成一个具有极度野心的人。毛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职位，但如果设，则不应该是毛而应该是林彪去当。但林坚决不当，连国家副主席都不愿意去当。正如林一贯主张的，并且其他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都支持的，国家需要个元首，只有毛自己才能担当这个职位。在这样的阻力之下，1970年8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当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带头攻击张春桥时，毛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歪打正着的机会。正如历史学界所熟知的，毛首先针对林彪小圈子里最弱的陈伯达展开了攻势，然后打击林的军队里的同党，最后毛一年以后到南方巡视，将他对林的不满宣之于众。正是在这种前因后果大背景之下，林的一家才出走的。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在2006年出版以后，新的关于林彪事件的书继续涌现。迄今为止，林彪的三位将军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出版了回忆录，另外一个黄永胜则有传记问世。正如1980年到1981年林案审判所宣示的一样，他们指出，他们根本不知道林彪刺杀毛泽东的任何阴谋。这些证词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疑问：如果林彪真的企图刺杀毛泽东，为什么把任务交给自己毫无经验、徒具血气之勇的儿子，而不去利用他的那些掌握军队的同僚来发动政变？

关于林彪的一些出版物包括：《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百年林彪》、《林彪日记》、《找寻真实的林彪》等等。新近又出版了一本据说是林彪事件关键人物，林的女儿林豆豆的所谓“口述”，但据说林豆豆本人对此并不认可。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九一三”回望》，就是对上述“口述”的反响。本书的作者们，对所谓来自林豆豆的答案提出了疑问。他们并没有试图为整个毛林传奇做出终极的结论——那是官方全部档案开放之后的事。但他们所知道的，已经远比刚知中国出了事的法国大使超出很多；正如本书所示，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

□ 原载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